

“经济人”假设与人的有限理性

陈美衍

摘要：人的有限理性使得经济学只可能是关于经济现象的最一般本质因素及其关系的知识体系。“经济人”是经济现象的最一般本质因素之一，故必然要包含在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之中。人的有限理性还使得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抽象单纯性，这使得能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只能由“经济人”构成。所以，人的理性有限性是“经济人”假设，尽管高度抽象简化，但仍能成为经济学家最广泛接受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 有限理性 抽象单纯性

“经济人”假设只反映了人利己理性的一面，是对现实人的高度抽象简化。这种抽象简化使它不断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或批评。可是，“经济人”假设仍成为当今经济学家最广泛接受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现在的许多反对者没有对这一事实的原因做深入的分析，而是提出了不少设想，希望取代它，但至今未有成功的迹象。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一现实提出的重要解释是：由于经济资源稀缺，利己性是决定人的经济行为的最重要因素。“经济人”假设反映了这一事实，所以能对经济现象做出较好的解释，而“所有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但没有说明为什么其他替代物会比它差。其实，他们也承认“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的解释是不完全的，具有抽象简化的缺点。但他们也没能进一步探究，他们使用这么一个解释力不全的、抽象简单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否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合理性根据。笔者认为，这种深层次的合理性根据是人的理性有限性。人的理性有限性也是“经济人”假设能成为经济学家最广泛接受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超越它的种种设想至今难见成功的根本原因。

一、有限理性与经济科学的真实和抽象

引发对“经济人”假设的高度抽象简化问题争论的一个深层原因是人们对经济科学的真实意味着什么，与抽象有什么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所以，要对“经济人”假设的高度简化问题有较科学的态度，首先要对纯粹经济学的真实和抽象问题有一个

科学的认识。而这必然要求对以下问题有科学了解：人的理性特征，科学真实的实质及其与抽象的关系，经济现象特征等。

人的理性基本特征首先是它的有限性。任何时候他也不能获得对事物完全的认识和把握。其次是他的感官知觉能力很有限。他这方面的能力比许多动物都不如，所以，若凭直接的经验观察归纳，他只能获得很有限的关于事物现象的知识。最后是他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他通过抽象思维能获得对抽象形式的认识。如果这种抽象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形式，那么，他就获得了关于事物的科学知识，而动物则不能。所以抽象思维常常被认为是人类具有高度的理性能力的表现。其实，人类常常忘了：抽象思维之所以被重视恰恰是因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而且抽象思维始终要受人的有限理性的制约。如果人类的理性是无限的，那么，无论事物多复杂，事无巨细都能被人们一览无遗，且完全在人们的预料与掌控之中，这样就可以完全真实地掌握任何具体事物，就不会只认识到它的抽象形式或本质形式。如果这样，再强调抽象思维和科学就是多余的了。可见，正是由于理性有限，人们才需要通过抽象思维来认识、把握事物，才需要科学。人的有限理性对抽象思维的制约表现在抽象思维并不总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形式，而且所把握到的本质形式也总是具有历史相对性。

科学是关于事物本质形式的认识。所谓事物的本质形式，就是指该类事物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共同

不变要素及其稳定的关系。显然,它不等于任何具体事物。因此,科学真实的实质是本质形式的抽象真实,而不是具体真实。如概率论说投掷一枚均匀对称的硬币时,正反面概率相等为二分之一。人们承认它是真实的或真理,但它并不是具体真实的。因为它并不表示这次正面,下次就是反面。即使是进行一次大数量的投掷实验,也不意味着正反面概率会相等。

本质形式是蕴涵在具体事物之中的,所以,要发现事物的本质形式,显然离不开直接充分的经验观察与归纳。但若仅有经验观察与归纳,不对经验观察与归纳的结果进行抽象,就不可能达到对本质形式的认识,就不会有科学。如数学家若不通过抽象认识到:硬币均匀且只有正反面这些事实是决定概率的本质因素,而诸如每次投掷硬币时的初速度、投掷角、地面的光洁度等等影响每次具体结果的因素会在大数定律的作用下会互相综合抵消,是非本质的,而拼命于对引致每一次具体结果的所有原因的观察、归纳和计算,那么无论如何细致,也得出正反面概率相等为二分之一的判断,也不会有概率论的产生。

可见,科学真实只能是抽象本质形式的真实而不可能是具体的真实,而且它要通过抽象才可能达到,这是有限理性使然。如果人们对此没有认识,放弃对抽象本质形式的真实的追求,去竭力于具体真实的追求,那就不会有科学的产生,对于所研究领域充满随机因素的科学更是如此。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

任何经济现象的决定远比硬币投掷结果的决定要复杂得多,它受到更为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观察到所有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并对其进行准确的计算,准确预知经济现象,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认识经济现象。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忽视抽象经济分析,过分子实际事物的具体真实,就不可能很好地促进经济科学的发展。德国历史学派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罗雪尔和施穆勒分别是旧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看,他们并不反对抽象演绎思维。他们实际上很轻视抽象思维的作用,反对抽象经济分析。罗雪尔说,对国民经济学来说,用抽象方法“来表达的便利,跟着应用它的事实的复杂化而缩减”。“由于我们这门学科是和人发生关系的,它必须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处理它们”。施穆勒则明确地

说,“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普遍一般的东西”;“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想要毫无漏洞地找到产生的原因,那毕竟远远做不到的事,对整个人类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那更是完全无此可能”。对他们来说,对经济事实的全面、详细的观察、描述似乎就是一切。罗雪尔十分欣赏柏拉图的“由注视知识的渊博而发生的眩晕是学问的开始”这句话。他认为:“完全与此相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者必须熟知人们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里对国家和公共经济所要求的东西曾经发生过什么变化,直到他茫然自失于沉思默想的惊叹中。”所以他主张研究者要“养成习惯,当他考察最琐碎的政治经济事实时,决不要忽视全面,不仅是公共经济的全面,而且还是国民生活的全面”。施穆勒则深信,依靠从个别出发的归纳法,是可能将国民经济实体的发展“综览无遗”。

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轻视抽象思维作用,看不到抽象经济分析的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为经济学家能够找到“完善的观察”,有能力全面熟知最琐碎的经济事实,靠对经济事实的全面、详细的观察、描述就可以建立起“综览无遗”如实“的经济学。可见,他们否定的是只包含“普遍一般的东西”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想建立严格真实的经济学。这是他们缺乏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自觉的体现。也正因为缺乏这种自觉,历史学派忽视了抽象的作用,忽视了对最一般的经济规律性知识的揭示,过度地沉陷于不堪重负的经济事实的归纳描述,结果不但没有建立起所期望的经济学,他们的经济学“事实上不具备什么经济理论”。

当代著名哲学家内格尔在论述《社会科学中的说明与理解》时曾指出,虽然严格普遍的社会规律并非未来就是不可能的,但在可以预言的未来根据经验的研究确立起这种规律的希望似乎有些渺茫。因此,希望靠极为细致的描述为基础建立严格普遍的社会规律,超过了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能力。这种方法并不会有效地增加我们关于那些现象之间的联系的知识,按照那些对于获得经验研究的例子来说并不必要的过分细致的区分来表述的普遍规律可能恰好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破烂货。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是这一论断的一个很好例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学还不可能揭示严格普遍的经济规律,现实有生命力的经济学只可能是关于经济现象的最一般本质因素及其关系的知识体

系。它的真实只可能是抽象的真实,而不可能是对实际事物的具体真实。这样,经济学中的人也必定不会是现实的人,而只能是其所拥有的与经济现象关系最密切的特性的抽象概念。

二、对理性有限性的自觉与“经济人”抽象

对有限理性的自觉是历史上的主流经济学家能够提出“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原因。他们对理性有限性的自觉主要体现在对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直接经验和归纳法的局限性有明确的认识,对经济学的目标有较合理的定位。

关于经济现象和直接经验归纳法,约翰·穆勒、西尼尔、门格尔、马歇尔等人指出,“经济现象所受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实验是经济学家不能使用的资源”,因此,人们对它“经验概括”的“效力”是“不确定的”。这样,利用“个别经验或直接归纳的方法”对于“经济现象”的概括“是很不充分的”,其效力也是不确定的。^①这表明,他们否定历史学派认为的存在对经济的因果关系进行“完善的观察”^②与“综览无遗”^③的归纳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经济学,他们认为,“倘使经济学可以”求得一些大体可用的概括论断,那就应当可以满足了”^④;经济学只可能是“一种揭示趋势的科学,而不是说明实际事物”;“它的目标是发现和探索某种重大的作用力量,好像这种力量独立起作用,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发挥任何干扰性影响”^⑤。这说明他们明确认识到,人们要获得对复杂经济现象的完全认识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也不可能建立起经济运行的严格规律,不可能提供实际经济实践所需的全部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于有限理性的自觉,经济学才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成为对经济中的重大作用力量的演绎进行分析的“抽象的科学”。这样一来,他们首先必须找到这种“重大的作用力量”,“经济人”假设就是作为他们探索的结果提出来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由于理性有限,科学的现实目标不是力图掌握现象的所有事实,而是发现事物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共同不变要素及其稳定的关系,使人类摆脱偶然性的摆布,认识必然,获得自由。所以,对人的理性有限这一事实有较充分自觉的科学家都清楚:科学追求的是对事物共性模式而非个性模式的认识与把握;^⑥它“对于混乱和无规律是无用的,因而不能容忍极端的非决定论”^⑦;“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去发现自然现象的最后的和不再变化的原因”^⑧。“经济人”假设的抽象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家

的这种科学精神。首先,他们认为它是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最终共同不变因素。他们指出,“被演绎科学作为基础的不可动摇的最终前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因此“重要的是开头不能出错”。“人的经济行为受到人追求财富的欲望的支配”。这“构成了人本质的简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其次,他们认为它是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共同不变因素。这一“事实”对经济现象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而占优势”。最后,他们排除其他动机作为逻辑起点并不是随意或失察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不是重要的共同不变因素。他们指出,“除了追逐财富这种欲望之外”,其他的动机“对个别案例是重要的,但与出自大量现象的例证相比,就不重要了”。这是因为“这些动机的影响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所以,“这些动机决不能成为需要考虑的第一位的东西”。正是基于这种科学性分析,他们得出结论说,“经济科学主要的学科范畴‘经济人’假设这个抽象完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经济人的活动完全决定于其追逐财富的欲望。”^⑨

“经济人”假设突出了经济关系中的人的利己的财富欲。它曾因此遭到历史上或当代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他们认为这使经济学“讨论人性的最低级本能”,是对“人”的“亵渎”^⑩,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人性的某种本能确实最普遍地支配着人类的经济行为,那么不管它再低级,人们在经济分析中也必须讨论它。其实,由于现实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利己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普遍支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当代,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除了极个别的学者外,即使是那些对“经济人”假设的高度简化不满的经济学家如福山、阿玛蒂亚·森等人,都承认“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是理性的、自私的”^⑪，“人们总是现实地追求他们的自利最大化”^⑫，“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决定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就会停止”^⑬。可见,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无法否认“经济人”是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共同不变因素。

三、经济分析起点的抽象单纯性与有限理性

引发对“经济人”假设的高度抽象简化的不满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人们的经济行为无时无刻地不受文化、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有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它们并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因素,所以认为将它们抽象掉是不合理的。

于是,有许多人主张将这些因素的一个或几个与“经济人”的结合体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笔者以为,这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的概念,它必定要反映或包含与人们经济行为关系最密切的特性即“经济人”属性。这实际上是包括德国历史学派在内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的,所以不存在疑问。否则,就不成为经济分析。关键的是第二个问题,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的概念,还直接地表征着经济解释分析的首要基准、尺度或视角,因此,它直接涉及可操作性和普遍认可性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与分析者主观理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笔者以为,由于理性有限性,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抽象单纯性的特点。所谓抽象,指起点概念所反映的是属性的一般,而不是属性的具体。如利己心就是抽象的概念,它不说明具体每个人利己心的存在情况。其原因是说明它的具体状况是属于实践的内容,而不是理论所能承担的责任。所谓单纯,就是指起点概念是简单直接性的,不需要进一步分析规定。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若不具有抽象单纯性的特点,那么,就需要对起点概念本身进行分析规定,由于人的理性有限,分析和进行各种规定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也必会进入概念之中,至于得出的是些什么规定,那就要依靠各人在他的直接的偶然的观点中找到什么了。这样,起点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偶然性、任意性和主观性。一个不能排除偶然性、任意性和主观性内容的概念自然就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和普遍认可性,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统一基准。

“经济人”假设尽管由利己心、最大化行为原则两个命题构成,但它具有抽象单纯性的特点。因为,在经济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利己心必然意味着行为的最大化原则。假设一个具有利己心的人在买苹果,那么,对于完全相同的苹果,如果他知道2元钱可以买到那么他就不会花3元买,否则他就等于送了1元钱给卖苹果的人,这违背他的利己心。当然,如果他不知道2元钱可以买到而花3元买以及如何知道2元钱可以买到、如何以2元钱成交都与最大化行为原则无关,因为,最大化行为原则所表示的是原则或欲望,并不表示实现的能力、程度与方式。可见,利己心直接蕴涵极大化原则。最大化原则若没有利己性,便是无意义的,所以它直接体现着主体内在的利己性本质。可以说,最大化原则只不过是外化的利己性。它们二者是直接同一的。它们之间不需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和规定。这是经济学进行最优

化分析时,没有必要再提利己心的原因。因此,“经济人”假设尽管是由两个命题构成,但它具有抽象单纯性特点。

到目前为止,希望超越“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设想都缺乏抽象单纯性特点。其结果是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和普遍认可性,使得本身成了人们争论辨析的对象。这样,它们没能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有效力的经济分析起点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比如,说人的经济行为受“经济人”影响,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是没错的,但将“经济人”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时,人们就会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二者各自对人的经济行为发生作用的强度进行界定;二是如何定义意识形态这个广泛而模糊的概念。有限理性使得人们不可能对它们有清楚确定的认识。其结果只能是像黑格尔所说的“要依靠各人在他的直接的偶然的观点中找到什么了”^{②4}。对于“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人”时所起的作用的强度,更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所以,必有人不同意把“意识形态”作为除了“经济人”之外的重要因素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比如,有的人认为“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十分重要^{②5},有的则认为“利他”重要。^{②6}可见,由于“意识形态”对人们经济行为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对其重要性看法的不一致性,使得“经济人”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体不可能成为经济分析的基准或逻辑起点,不可能成为可以普遍运用的有效力的分析工具。对于“经济人”与“忠诚”结合体或“经济人”与“利他”非理性^{②7}的结合体来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科学经济人”^{②8}的概念更是反映了新解释因子选择的随意性、主观性、偶然性的特征。

特别值得深入分析的是“社会人”主张。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所做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9}这是至理名言。不过,人们应该明确的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对人的总体本质特征及其决定进行的科学揭示。社会关系是异常复杂的系统,除了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外,还包括人们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家庭伦理关系等等。马克思的科学论断说明了人的本质是多方面具体本质构成的有机体。但它确实并不说明人在具体某种社会关系下人的具体心理行为特征。应该说,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人所具有的各种具体本质特征对其心

理行为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经济分析来说,“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或“社会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如果它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首先就会碰到如何确定如此复杂的关系怎样具体决定人的本质构成的问题。人的有限理性使得它只能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是一个难以排除主观性、偶然性、随意性因素的干扰而得到科学界定的问题。由于无法对它科学界定,也就无法科学把握其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特征,这样,“社会人”自然就不能成为经济分析的一致的可靠的基础。实际上,试图在“人的本质”这种一般判断基础上建立的科学是一种“总科学”,人类可能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不需要一个研究和供给综合的人的‘总的本质’的总科学”^[30],而是人类现有的理性还根本无法使之成为可能。故在现有的理性能力条件下,经济学不应该有成为“总科学”幻想,否则,不但得不出什么“总科学”,而且还会使经济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所以,某个学科只能是“关于人的某一种本质的研究”^[31],经济学还只能是关于人的“经济人”这种具体本质的研究。

希望超越“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都承认“自利最大化”对经济行为的支配地位,但都没能在其他解释因子的选择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经济人”是决定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最重要的共同不变要素,其他“动机的影响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只将“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显然是客观现实的要求。现代概率论告诉我们,凡事皆有因,必然是绝对的。说某事件是随机的,只是说明我们缺乏观测预知其所有原因的理性而已。因此,只将“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归根到底又是人的理性有限使然。

在现实中,如果为了能够对某一方面的经济社会现象获得更加具体的认识,或在实践上为促进某种社会经济目标,需要引入或强调“经济人”之外的某些特性,解释或促成特定经济行为,这是正常的而且有时也是应该的。其实,这与“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并不矛盾。因为,一方面,它已超出了一般经济分析;另一方面,最大化行为原则所表示的是原则或欲望,并不表示实现的能力、程度与方式。需要引入或强调“经济人”之外的某些特性,在原则上完全可以作为最大化行为实现的能力、程度与方式的约束条件得到说明。因此没必要非得构

设出一个新逻辑起点不可。再说,那至少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现代经济分析从根本上讲是最优化分析,最优化分析的合理性依据正是“经济人”,因此若没有“经济人”假设,就没有现代经济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经济人”假设,才使得经济学家有限的理性在面对层出不穷、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时能保持较敏锐的洞察力,抓住现象的本质要素,使得经济学能有较统一稳定的分析方法与框架,从而超越了以往只能是对转瞬即逝的经济现象做历史描述和就事论事地发表经验性观点与意见的发展状态,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具有超越时空的理论效力和工具性价值的学科。

注释:

宾默尔·肯:《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1卷):公平博弈》,中文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转引自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载《经济研究》,2005(11),第22~33页。

^{[13][14]}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读》,326,360~361,325~326,359,326,331,359,363,359,3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1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中文版,608~60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1][15][19]}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文版,8,99,9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6]费多益:《科学的合理性》,中文版,4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7]加里奥·本格:《科学的唯物主义》,中文版,3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8]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中文版,15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0]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载《经济学动态》,1997(5),第55~60页。

^[21]福山、弗兰西斯:《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文版,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转引自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载《经济研究》,2005(11),第22~33页。

^{[22][23][25]}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文版,21、24、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4]黑格尔:《逻辑学》,中文版,上卷,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26][27]}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载《教学与研究》,2003(11),第22~26页。

^[28]李炳炎、江皓:《“科学经济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载《学术研究》,2005(12),第21~2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31]}赵德志:《关于人的经济学抽象》,载《学习与探索》,1987(1),第57~65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N、K)